

◀ (上接 14 版)

体诗歌《归途》(De reditu)的残篇——在他个人图书馆的书目上并没有提及这部作品——在 1817 年,人们仍可能并不清楚 1400 年前,路提里乌斯开始沿着第勒尼安海岸北上前往高卢南部他家族的土地。路提里乌斯仔细地记录了他出发的日期是建城以来的 1169 年(《归途》1.135-136),然而这一年可能是公元 416、417 或者甚至是 415 年,这要看他如何计算罗马城的建立之日。人们曾经有各种各样的观点,直到 1973 年米雷拉·费拉里(Mirella Ferrari)公布了这部诗歌的一份新的残篇,发现于都灵国立大学图书馆保存的羊皮纸堆里,其中提到了执政官君士坦提乌斯和皇帝霍诺留(Honorius)的妹妹加拉·普拉奇蒂亚(Galla Placidia)的婚礼(《归途》fr.B.14),由此解决了日期上的争议——在诸多研究者中,阿兰·卡梅隆(Alan Cameron)把这个时间定在公元 417 年的 10 月。

如果《哀怨集》让我们较早地瞥见了罗马文学少了罗马城的样子,那么古代晚期则是其他作家追随奥维德的脚步——从罗马到罗马尼亚——的时代。正如拉尔夫·赫克斯特(Ralph Hexter)所说:“奥古斯都将奥维德送往罗马帝国的最边陲,实际上是将他送入了一部时间调至公元 650 年,或者在此前后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机器中。”公平地说,即使在 410 年遭受了重创,阿拉利克的哥特军队成为了大约 800 年的时间里第一支洗劫这座城市的外国部队,但路提里乌斯所描绘的罗马是奥维德多少都能够认出来的罗马。路提里乌斯旅程的日期引起了如此热烈的讨论,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在 5 世纪,罗马城度日如年。在公元 417 年,正如在公元 1817 年一样,在漫长的争斗后,和平刚刚恢复,西欧的势力正在重组。在 418 年,哥特人根据合同约定居在了阿奎塔尼,而这一年的春天,高卢行省议会在阿尔勒重新恢复。有人推测,像路提里乌斯这样在罗马帝国行政机构中担任要职的元老回去参加高卢议会的。路提里乌斯并没有太多地提及他旅程的目的,只是表示他需要赶快前往他自己祖先的土地,这些土地在战争引起的动荡之后都变为了一片废墟(《归途》1.19-30)。

无论他回家的目的是什么,路提里乌斯告别首都,在风

暴中航行,前往一个被战争所蹂躏、并且刚刚成为抵抗蛮族前线的地方。此时,他把自己描述成像奥维德一样遭到放逐。在《归途》开始的部分,当路提里乌斯赞叹辉煌无比的罗马时,他呼喊道:“啊,我不知有多少次将那些有幸诞生在这片乐土上的人认作是幸福的!”(O quantum et quotiens possum numerare beatos / nasci felici qui meruere solo! 《归途》1.5-6)这首诗的第三组对句被看成是对奥维德流放诗的明确影射:“啊,那些被允许享受这座不设防城市的人,其幸福是多么巨大,多么不可胜数。”(O quantum et quotiens non est numerare beatum, / non interdicta cui licet urbe frui 《哀怨集》3.12.25-26)亚历山德罗·福(Alessandro Fo)评论这些诗句时说:“路提里乌斯似乎要告诉我们:这是我自己的《哀怨集》……因为我的归途确实是一种放逐,离开了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说:通过引用奥维德流放诗中的回忆,路提里乌斯得以表达出他离开罗马的痛苦——按照歌德的说法,那是一种独特的、无法形容的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真正地体会到那种感觉。因此,当路提里乌斯离开永恒之城前往他自己的故乡时,他和歌德一样,对奥维德《哀怨集》中的文学构建之地感到亲切。

或许对路提里乌斯来说,他离开罗马更加令人痛心,因为这座城市正处于它历史上的危险阶段。在它被一系列的蛮族国王争夺之前,罗马帝国对这座城市的统治还能够维持 60 年。然而 410 年对罗马城的洗劫已经是一个灾难的

不祥之兆,对这种凶兆的想象许多世纪以来经常萦绕在罗马人民的心头。在穿过波图恩西门(Porta Portuensis)之后,路提里乌斯向罗马女神献上了一篇长长的告别演说(《归途》1.47-164),在演说中他请求罗马女神从她近来的伤痛中恢复过来,重新宣告她“世界首都(caput mundi)”的地位。路提里乌斯说道:“你用不同的族群营造了一个祖国,你把曾经的世界变成了一座城。”(fecisti patriam diuersis gentibus unam / ... urbem fecisti quod prius orbis erat 《归途》1.63, 66)。在城市(urbis)和世界(orbis)这两个词之间玩文字游戏在罗马文学中并不少见,但是路提里乌斯的五步铭辞(epigrammatic pentameter)可能最接近奥维德的《岁时记》(Fasti) 2.684:“罗马城和世界一样大”(Romanae spatium est urbis et orbis idem)。歌德也用《岁时记》来表达他的乐观主义,认为多变的世界中潜藏着和谐。他的《第二次罗马停留》的题词选自奥维德作品中罗慕路斯在建立罗马城时的祈祷:“但愿这片土地能够像世界的女主人那样享受着长寿与权力,但愿时间像日出和日落一样臣服于她(longa sit huic aetas dominaeque potentia terrae / sitque sub hac oriens occiduusque dies)。

在《变形记》的最后几行中,奥维德将他自己的命运和罗马帝国的命运联系起来,预言“罗马帝国的统治和领土扩大到哪里,哪里就有人会阅读我的作品(quaque patet domitis Romana potentia terris, / ore legar populis 《变形记》15.877-78)。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德语文学者库尔提乌斯(1886—1956)

接受奥维德作品的地域比他所能想象的还要大得多,而且这些地区各有特色,任何研究都只能是局部的、片面的。对我来说,我试图接受我文章中的这种片面性,通过将两个除了都与周年纪念有关外毫无关系的故事(以奥维德的方式)结合起来。我要再次重申的是,歌德从未意识到他和路提里乌斯之间的相似——而我认为他们有着十分相同的地方。无论如何,我认为路提里乌斯代表着奥维德从罗马城的诗人到世界的诗人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从此以后,当“罗马势力”的其他踪影从“被征服的土地”上开始消逝时,奥维德的流放诗成为了那些失去罗马的罗马人希望通往罗马的媒介。如果转换一下视角,从 417 年来展望 1817 年,就有可能得出一个更加大胆的结论:歌德对奥维德,以及对罗马世界的观点,总体上能够被看成是典型的古代晚期的观点。

德国学者库尔提乌斯(E.

R. Curtius)在晚近国际政治重组的背景下,将歌德看成是延续了 2600 年的欧洲传统终结的标志。他宣称:“只有当一个人从荷马时代到歌德时代都拥有公民权,他才能将欧洲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当一个人成为罗马公民之后,他才能算是一个欧洲人。”我怀疑如今大概没有多少人会赞同他的这种时代划分。而我希望澄清的是,我所强调的周年纪念不仅在奥维德文学的历史中,且在罗马文学国际化的历史中都是颇有意义的时刻。

当奥维德在两千年前于托弥去世时,这还不是流放文学。而在路提里乌斯的《归途》中可以看到的是流放文学从古代罗马开始向现代欧洲迁徙的第一步。而库尔提乌斯将歌德看成是这一迁徙运动的终结。无论歌德读过多少路提里乌斯或者其他古代晚期作家的作品,他仍然和他们一样共同拥有着一种对过去的疏离感。他们需要维护某种跨越国界的文化共同体。他的确怀念一个拉丁语能够作为“普世语言”进行知识交流的时代,但他认识到文字共和国已经变得过于庞杂多样而不能再用任何一种单一的语言互相交流。因此,让歌德的“世界作家”理念显得十分具有奥维德特色和古代晚期特色的并不是某种主张“同源于罗马”的倒退性理念(some regressive idea of common Roman origins),而是一种对流放、混杂和边缘的体验。从这方面来说,在去世后的第 21 个世纪,奥维德确实成为了一个超越国界的诗人。

(作者 Ian Fielding 为密歇根大学拉丁语助理教授,其撰写的关于奥维德作品在古代晚期的转变的著作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威廉·特纳(J. M. W. Turner)1838年的画作《奥维德被逐出罗马》